

文章编号:1674-8107(2015)01-0046-08

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及其时代价值

邵小文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20世纪50至60年代,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与实践,集中体现为在“教育要革命”的主题下,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和变革。他力图推动教育和科研工作自觉关注社会需求和生产发展,实现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又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尽管其实践存在诸多问题,但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人才培养;教育革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5.01.009

“教育要革命”是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这句话曾深深影响了20世纪50至60年代新中国有关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许多政策和实践,也概括性地表达了毛泽东对当时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总的看法。一直以来,对这一问题,以及相应地对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不同看法和争议有很多。本文将尝试通过探寻毛泽东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实践,梳理“教育要革命”这一理念所包含的丰富历史信息,揭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启示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教育要改革:科技人才的匮乏与经济建设的需要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国家处于战时的非正常状态,可谓“一穷二白”。就经济建设层

面来说,突出表现为工业化程度极其低下。建国前,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工业部类不完整,结构不合理,分布极不平衡,除了一点采掘工业外,其他重工业部门几乎一片空白。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制造企业不独立,绝大多数为外资所控制。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业,且多数是技术简单、设备简陋的小企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很低。总的来说,几种主要工业品(煤、电、钢、棉布等)的人均占有量,“不仅不能与同时期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就是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落后的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也是远远落后的,甚至低于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1](P7)}对这种落后的程度之甚,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2](P130)}

收稿日期:2014-04-15

基金项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项目“教育要改革:50-60年代毛泽东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MFHKT20111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我国知识分子价值观的分化与凝聚:基于意识形态安全的考察”(项目编号:12YJC710051);广东省哲学社科规划青年项目“知识分子价值观认同与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项目编号:GD11YMK02)。

作者简介:邵小文(1981-),女,山东临沂人,讲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研究。

工业的不发达,导致当时的科技人才“全无用武之地”。“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理念的应用型学科知识分子,本应是国家最为急需的人才,却迫于现实无奈转行,就算费尽辛苦到国外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也一样,“文法科以外的学生,几乎可以说是英雄全无用武之地”。^{[3](P150)}“学工的回国后无厂可办,学矿的无矿可开,学林的无林可植”,其结果“只好去教书”^{[4](P317)}。“那培养科学家、技术师、工程师的学校,移到中国,只培养了一批一批的候补官员和教员”。^{[5](P82)}出现了严重的学无所用、学用分离的状况。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上偏重于轻工业和维修工业,制造业与尖端专业空缺,工科大学生占学生总数比例偏低,更加剧了科学技术人才的匮乏。

因此,科技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着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制约着大规模经济建设地开展。而随着社会改造的基本完成,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视野下,毛泽东呼吁全党、全国要重视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6](P469)}，“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7](P2)}。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步,在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如何尽快地培养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工业化需要的人才队伍,尤其是工业科技人才。

问题在于,旧中国留下的科技人才队伍,不仅数量很少,结构失衡,而且这为数不多的科技人才还有不少迫于客观条件走入“官”、“学”两道,未能将所学所长与实际建设需要结合起来。摆在新中国教育面前的任务,就不仅仅是量的问题,还有质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内部如何调整、扩大人才培养的规模问题,还有如何变革教育模式,使得人才培养能够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教育要改革”。应当说,建国初期向苏联学习为主的教育改革,在解决前一个问题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然而,要较好地回答后一个问题,却必须跳出“就教育谈教育”的窠臼,将教育与产业发展联系起来,这恰恰就是50至60年代毛泽东教育思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毛泽东关于人才培养道路的一些独特思想和举措,也正是针对这一

历史任务所提出和实践的。

二、教育改革途径:科技工作与生产实践相结合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经济的大发展,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7](P2)}。而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在于,他认为仅仅有一支科技知识分子的专家队伍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支科技知识分子队伍能够摆脱传统社会那种学术脱离实际的学风,改正排斥劳动第一线的工农群众、不善于从他们中汲取科技创新有益经验和启示的偏差。因此,他希望科技知识分子在进行技术创新及其他学术活动时走群众路线,到工农群众中去,将研究与生产劳动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来,这正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教育改革的途径。在毛泽东看来,特别是技术革新这样的科学技术工作,不可能在书斋和实验室里进行,必须而且只能在群众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发展的源泉与动力,并在科技人员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得到真正的推进。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实践。毛泽东于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提出“技术革命”和“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上去。经历了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暂时冲击后,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结论时又再度提出,工作的“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8](P25)}。在将这篇结论补充整理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重申:“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9](P51)}

1960年1月23日,毛泽东看到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时,即认为“可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所有中等城市党委,加以研究,参照办理”^{[10](P17)}。此后,他连续转发有关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况的报告,提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11](P77)},从而推动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在农村,这场运动主要表现为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其核心内容是:通过干部、科技人才和群众相结合,在一定面积的田地上实验农业科学技术,再以此为示范,推广先进技术和高产成果。此即1957年毛泽东曾倡导过的“种试验田的经验”^{[12](P309)}。然而大跃进时期的浮夸作假败坏了“试验田”的声誉,之后毛泽东也不愿再提。但这种方式仍受到人们欢迎。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运动》的社论。各地农业科研机关开展了以大办样板田为内容的科学实验活动,实际上是“种试验田”的升级版。有学者指出:“在端正方向排除那些空洞的政治口号后,群众办科技的活动(而不是运动)仍在不间断地进行着。目前,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200多万农民技术员,和遍及全国的科技示范户、专业户,就是60年代出现的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继承和发展。”^{[13](P102)}

在城市企业生产建设过程中,这场运动典型地表现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模式。“鞍钢宪法”是毛泽东在批示《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总结概括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三结合的原则。^{[14](P91)}

历史地看,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是基于落后的生产技术水平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需求而出现的必然要求。农以种为先,50年代农业生产中对育种增产的技术革新需求最为迫切,“试验田”等群众性科学实验小组就是首先为育种选种发展起来的。“鞍钢宪法”的形成,也是类似的情形。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罗定枫回忆道:“作为形成市委《报告》的当事者,我能鉴证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确实是鞍山市委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下,对鞍山、特别是鞍钢的生产实践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之后形成的。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干部、工人、科技人员迫切希望加快祖国建设、尽早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良好愿望与热情和以主人翁责任感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的钢铁工业探索出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可贵经验。”^{[15](P28)}

除了现实需求的影响,毛泽东最为强调的科技知识分子要到生产实践中去、工农群众参与科研工作和技术革新等观点,强调科技专家与群众相结合,极力推崇工人参与管理和技术革新的“鞍钢宪法”,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那就是力图打破科技知识分子过于固守实验室、脱离生产实践的状况,从而克服科研工作与生产建设、产业发展缺乏应有互动的弊病。在生产建设第一线工作的工农群众,最熟悉和了解生产发展对科技工作的具体要求,让他们参与科研和技术革新,也正是同样的目的。一句话,必须培育一种科技工作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机制。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和生产大发展的历史经验印证了这一点。近代自然科学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伴生物最先在欧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并随即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16](P570)}。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十分关注科技发展,并不断投资推动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扩大应用,“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16](P570)}。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是西方科技发展的社会土壤和主要推动力;同时,西方科技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因此,西方近代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就是依托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了科技与生产紧密结合,科研工作以生产需要为核心,科技人才的培育围绕并依托产业发展,建立起科技与生产的良性互动机制及相应的配置格局。

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新中国也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倡导科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前者参与生产实践,后者参与科研工作,实质上是力图创造一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可能途径,引导科技工作围绕生产发展,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从这一点来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现代意义。

三、人才培养模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教育是培养人才、培养更多知识分子的领域。在工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教育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主,且大多奉行“通才”模式的教育理念,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是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试图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角度改进知识分子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尤其是改变中国科技知识分子规模严重不足的状况。通过构建一批工科类专门院校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为培养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整个教育体系向专才培养方向调整,职业教育也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各种工业建设稀缺人才和师资队伍,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补充扩大。然而这种教育改革方向与不少高校知识分子的“通才”模式教育理念存在紧张关系,遭到他们的抵制。从1950年6月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提出院系调整,到该年年底拟定《1952年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并经政务院批准,却延至1952年4月才公布,中间一度搁置数月之久,可见阻力之大。

今天的研究者常常与当时抵制院系调整的高校知识分子一样,将这次调整视为教育领域苏联模式与欧美模式的对立,却都忽略了在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教育发展都经历过类似阶段,不仅是苏联,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也同样经历过强调教育为工农业生产服务、注重培养专门人才的阶段,持续时间还很长。以美国为例,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莫雷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由联邦政府赠地给各州,以其土地经营所得用于开办农学院,培养机械及农业科技人员;至1963年,历经百年发展,美国的工程院校发展到247所,大大促进了国家现代工农业的发展。在此过程中,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就是直接为产业服务:为建设铁路、公路,就培养土木工程师;为开发矿藏,就培养采矿工程师;为设计工具和机械,就培养机械工程师等。^{[17](P5)}中国的院系调整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正是类似的情形。

在大力创办工程技术院校、改革教育为产业服务的同时,美国还吸取了欧洲一些大学如英国

伦敦大学、德国洪堡大学、法国理工学院的办学经验,采取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从而形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同时推动了教育、科研和产业大发展,成为促进国家快速发展和经济发达的重要原因。

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段历史经验来看,以院系调整为代表的教育改革还只是在人才培养的结构调整方面下功夫,要推动教育与产业的融合发展还必须跳出“就教育谈教育”的窠臼,让师生走出课堂和实验室,拓宽教学和科研的活动场域。由此观之,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教育方针和教育模式的探索,其价值突出表现在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8](P226)}此即1957年的教育方针。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概括性地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教育方针。^{[19](P11)}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毛泽东极其详尽而具体地列举了各级各类学校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他认为:“教育这个东西比较带原则性,牵涉广大的知识界,是一个革命。几千年来,都是教育脱离劳动,现在要教育劳动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大体上有这样几条:一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一条是党的领导,还有一条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大家懂得,没有问题了,党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中心问题是教育劳动相结合。”^{[20](P396)}并进一步提出:“书就是一些观念形态,人家写的,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读,净搞意识形态,别的东西看不到。如果是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校有农场,人民公社办学校,勤工俭学,或者半工半读,学习和劳动就结合起来了。这是一大改革。”^{[20](P396)}

除了生产劳动本身具有的教育意义,毛泽东更为强调和注重的是教学、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推动经济建设与发展。为此,他不仅鼓励学校办工厂、农场,也倡导地方企业和公社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办学校,倡导学校与地方企业和公社

合作办学。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中就体现为办学形式多样化。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和农场,可以自己办,也可以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办工厂和农场,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结合。学校也要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开办学。”^{[21](P6)}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的学校,“可以训练工厂和农业合作社自己所需要的人才,也应该为其他工业部门或农业部门训练人才”^{[21](P6)}。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的教育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发展起来。

新中国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像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主要通过国家大量的财政投入或资源调拨,或者由资本家资助办学,来推动教育融入产业发展。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多形式办学,就有克服经费和资源有限方面的考虑,而在这一过程中,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推广落实而创建起来的“产、学、研”相结合的模式,也不失为从中国国情出发促进经济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当然,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这场教育革命也出现了盲目追求速度、过快扩大规模等问题,“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劳动在某些场合被片面理解为简单重复的体力劳作,师生参加劳动过多冲击了教学秩序的情况也不少。后来,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压缩规模、精简人员、重新调整和整顿学校秩序就成为教育领域调整的主题。1960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制定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等,强调“以教学为主”的原则,要求学校必须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提倡“办少些、办好些”,要在统一领导下提高教学质量。^{[22](P306)}

应当说,这些调整在当时纠正偏差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并没有解决大规模生产建设对改革教育模式提出的要求。毛泽东对这场教育大革命所寄予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他在教育领域的探索也远没有停止。因此,对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验,成为他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的主要内容,也就不难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第十条“教学改革”提出:“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方法,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在各类学校中,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制要缩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有的首先删繁就简。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就是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23](P67)}这个条目的最后一段正是出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五七指示’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领域。教育革命中的一切试验和举措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它或明或暗、或大或小的影响。”^{[24](P5-6)}具体说来,“五·七指示”对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要求是针对当时两类对象来提的:其一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军队官兵等各个领域的一线工作者,主要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群众,他们通常具有较为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但文化水平不高,需要“知识化”;其二是接受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但因为学习主要在学校里进行,较为脱离社会生产实践,对实际情况不很熟悉,需要“劳动化”。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毛泽东强调得更多的是针对上述两类对象各自的不足,力图有所弥补,倡导各个具体行业及其从业者能在“有主有从”、“调配适当”、“兼学别样”的原则下多样发展,借此打破各个行业及其从业者的发展囿于自身狭隘领域的格局。就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处于知识的习得阶段,主要任务是学习,但这种学习不能局限于课堂,还要同时参加到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去,因此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不难发现,这其中表达的思路与此前毛泽东在1957-1958年时提出的教育改革思想是相通的。“十六条”在该条目中,不仅收入了毛泽东“五·

七指示”中关于“学”的部分的论述,而且重提1957年的教育方针^{[23](P67)},也正说明了二者的内在共通性。同样的思路也表现在此后的“七·二一指示”中。

从1957年的教育方针、“五·七指示”到“七·二一指示”,一脉相通之处即在于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而学生要参加生产实践,工人也要参与教、学。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这份调查报告中对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是从改造世界观的角度来提的,而毛泽东修改了这句话,强调这也是“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25](P508)}这一修改充分表明,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教育尤其是科学技术研究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

四、未完成的变革: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科技进步更是突飞猛进。社会主义中国从一个不能自主生产“洋火”的落后农业国家,发展为世界上掌握科学技术最为先进、全面的大国之一。站在今天反观毛泽东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必须承认他的思考和探索的局限与不足,尤其要承认其在实践中导致的消极后果,但是同时也要看到,毛泽东所针对的问题及其采取的解决思路,依然具有鲜明的当代价值。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和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才来展开的,这一目标至今仍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科技论文产出的大国,然而高论文产量却不等于高质的科研成果。大量的实验室建设和大规模的经费投入,在航天科技、重工机械等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然而从总体上说,在科研产出和科技转化方面还是差强人意,科技人才尤其是能够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科技创新人才依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人们总在感慨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苹果”和“微软”,“山寨”大国的帽子略显沉重。科研论文大国并不等于科研强国。

因此,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而言,毛泽东思

考的方向可以说依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就是要走出一条产、学、研有效结合、良性互动的发展道路,教育改革也有相应的配置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强调“教育与经济、社会的结合”,倡导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要求高校要“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等,也是基于同一思路,这也应当说已是现代教育改革的共识。而具体如何落实这些战略安排,还需要切合实际的战术设计和不断实践。

毛泽东时代曾经借助教育改革和“教育革命”,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尽管这些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探索和试验性质,其过程充满了艰辛曲折和剧烈变动,结果也不能令人满意,但其中一些举措似乎不应一概否定。例如推动办学多样化,鼓励学校办工厂、农场,也倡导地方企业和公社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地办学校,倡导学校与地方企业和公社合作办学。

应当说,他强调“教育要革命”,批评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和推动许多教育改革的举措,要求知识分子走出所谓纯学术的窠臼,自觉关注社会需求和生产发展,实现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又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和技能,符合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然而这些探索和尝试却不能不受到当时政治生态的影响。文革期间的“教育革命”更是在“两条阶级路线”的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中展开,在实践中频频走向绝对化、极端化,甚至产生了一些人为制造的纯粹为政治斗争张目的事物,不仅使得探索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效果大打折扣,还造成了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思想混乱,消极影响深远,以至今天再提到“教育革命”,都会使人联想起那些极“左”的做法和空洞的政治口号,阻碍了对这些探索和试验更进一步的经验总结。就如美国学者观察到的那样:“研究与生产相结合本是个好主意,但现在这个好主意因使人联想到‘文革’的动乱,也就变得声名狼藉了。”^{[26](P385)}因此,对毛泽东的“教育要革命”的思想及其实践的认识和评价,及其对今天教育发展的可能启示,还有待在清除极“左”思潮影响的前提下,做更多的辨析和研究。

或许可以这样说,就“教育要革命”所关注和表达的核心问题来说,改革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是一个至今仍未完成的任务。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教育的任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在提高,人民对教育的

期盼和要求也在提高,在这一教育方针(“二为”)的指导下,新时期的教育制度必将迎来更深化、综合性的改革。而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思考和尝试,对今天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坚持贯彻“二为”的教育方针不无启发意义,其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尤其是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如何有效结合起来,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仍然是今天的教育改革所必须高度重视的主题。作为一场对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未完成的变革,“教育要革命”的当代价值,或许也就在这里。

参 考 文 献

- [1] 蒋伏心,左用章.中国现代化曲折三十年[M].南京:南京出版社,1998.
- [2]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1954年6月14日)[A].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3]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
- [4] 清华大学1960年访问记录[A].李喜所.近代留美生与中外文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 [5]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 [6]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6年1月20日)[A].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7] 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956年1月25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8]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1958年1月21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9] 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年1月)[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10] 毛泽东.转发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的批语(1960年1月23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1] 毛泽东.中央关于加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领导的批语(1960年3月16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2] 毛泽东.关于农业问题(1957年10月9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3] 李泽周.毛泽东对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贡献[A].邓力群.毛泽东与科学教育(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 [15] 罗定枫,洪淑英.枫叶知秋[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
- [16] [德]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A].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7] 谢祖钊,傅雄烈.高等工程教育概论[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2.
- [18]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9] 毛泽东1958年的一次谈话[A].毛主席论教育革命[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20] 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8日)[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日)[A].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58)[Z].北京,1959.
- [2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 [23]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A].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文化大革命文件选编:第1集[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68.
- [24] 郑谦.被革命的教育——“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 [25] 毛泽东.对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和《人民日报》编者按的批语和修改(1968年7月)[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2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Mao Zedong's Meditations on Talent Training Modes in 1950s to 1960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s

SHAO Xiao-wen

(School of Marx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theories of education practices in 1950s and 1960s center on his meditations on and reformations of talent training modes under the guidelines of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He earnestly attempted to propel China's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wards focuses of social needs and production development, to integrate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nd train talents with correct political views, realistic social concerns, proper proficiency and skills that fulfills the needs of socialist modern construction. In spite of the many flaws in its practices, such thoughts are still inspiring for our education reform in 21st century.

Key words: Mao Zedong; talent training; education revolution

(责任编辑:韩 曦)